

# 绝对与相对人口压力： 20世纪20—30年代无锡农户生存发展的突破与限制

余文君<sup>1</sup> 隋福民<sup>2</sup>

(1. 南京大学 经济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本文以“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数据为基础,结合亚当·斯密的“生存价格”分析发现:20世纪初无锡农户绝对人口压力较大,相对人口压力通过本地工商业和村外非农就业得以缓解。人口压力间接加强斯密型劳动分工和非农经济的发展,但地租和高利贷却限制了贫困农户非农就业的生计路径,占地少且人力资本低的农户面临持久的生计问题。农户间的贫富差距可加剧土地买卖兼并的问题,并进一步固化贫富差异,使人地压力呈现两极化趋势。与有限的土地资源相比,地权分配不均以及由此形成的剥削制度是无锡农户人口压力和生存危机的症结所在。

**【关键词】**人口压力;生存压力;无锡农村调查;土地分配;农户生活水平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2)04-0096-13

## "Absolute Population Pressure" and "Relative Population Pressure": the Breakout and Limits of Wuxi Peasants' Living Strategy

YU Wen-jun<sup>1</sup> SUI Fu-min<sup>2</sup>

(1.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2.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732)

**Abstract:** Based on the "Wuxi-Baoding Rural Household Survey" and Adam Smith's "subsistence price", this paper finds that between the 1920s and 1930s Wuxi peasants were under the absolute population pressure, but the relative population pressure was alleviated through local industrial-commercial development and urban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The absolute population pressure to some extent enhanced Smithian division of labor and non-agricult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land rent and usury limited poor households to improve their standards of living through the way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Households with little arable land and low human capital face persistent livelihood problems. Moreover, wealth inequality aggravated land annexation and in a further way solidifies such inequality, which also results in a polarization trend of population pressure. Compared to the limited land resource, the allocation system of land rights and the exploitation system were the crux of the population pressure and living crisis of Wuxi peasants.

**Key words:** population pressure; livelihood pressure; Wuxi rural household survey; land allocation; living standards of peasant households

**【收稿日期】**2021-12-02

**【基金项目】** 用友基金会“商的长城”重点项目“中国农民的商业化行为研究:一个历史的视角”(2019Z01);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工业化市场化进程中的农户家庭经济研究:一个以‘无锡、保定农村调查’为基础的长时段视角”

**【作者简介】** 余文君(1986-),女,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为近现代中国农村经济;隋福民(1972-),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农业农村经济。

人口压力是学界研究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话题之一,并经常与生活水平联系起来讨论。相关研究从局部地区或全国的统计数据入手,分析人地比例、人均粮食产量和口粮消费、农业剩余劳动力以及劳动力边际报酬等指标,并普遍认为近代中国农村人口压力巨大,人民生活水平低下<sup>①</sup>。近年来一些研究利用地区案例反证人地压力并没有以往认为的严重<sup>②</sup>。现有人口压力的研究反映出一些问题:一,所使用的测量指标其标准差异较大,标准的界定不够严格。二,忽略了不同农户的人口压力差异,即农户的人口压力因家庭人口结构、家庭分工、就业结构以及资产占有等情况而各有差异。三,一些研究认为人地压力直接导致马尔萨斯式生存危机,忽略了近代农村工商业和市镇经济对农户人口压力和生存压力的缓解。本文利用20世纪20—30年代“无锡、保定农户调查”<sup>③</sup>中的微观家庭数据以及新的测量指标分析无锡农户的绝对人口压力和相对人口压力,并讨论两种压力对农户生活水平和农村经济的影响。

## 一、两种理论影响下的人口压力研究

前工业社会,人口压力的相关理论主要见诸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马氏认为人口的几何级增长势必与生活资料的算术级增长形成不可避免的人口压力,这种压力最终通过战争、瘟疫、饥荒和疾病等方式得以周期性地缓解<sup>④</sup>。与马氏相左,亚当·斯密注意到人口增长之于经济的积极作用,高密度人口引发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提升了劳动生产力,促进商业贸易以及市场发展。分工的精细程度取决于市场范围,而后者又深受人口数量和密度之影响。斯密肯定了人口增长与经济繁荣之间的积极关系。但在解释近代中国人口压力问题上斯密型人口动力似乎并未受到经济史学者们的足够重视。西方工业革命促使人类生产力大幅度提高,从而导致世界人口在工业革命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出现较高幅度的增长。近代中国并没有发生欧洲式的工业革命,学者们普遍认为近代中国的人口模式仍旧是马尔萨斯式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传统模式<sup>⑤</sup>。在此模式下,人口增长导致人地比例失衡,加重人口危机。诸多学者对中国人口压力的见解也深受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影响。例如,伊懋可认为中国自明末清初时期农业发展就进入一个“高水平陷阱”,人口的增长完全消耗掉农业技术改进所带来的收益,导致农村经济发展的停滞<sup>⑥</sup>。黄宗智也以“过密化”理论描述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口压力导致边际报酬随着劳动密集化而递

① 相关讨论参考王跃生:《华北农民家庭人口生存条件分析——对20世纪30—40年代冀南农村的考察》,《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该文章以人均土地低线为标准,认为冀南农村大部分农户的自有土地无法维持家庭基本生存。张丽:《人口、土地和农业生产水平:二十世纪初无锡农村地区人口压力的测量》,《中国农史》2007年第3期。该文章从人均土地粮食产量和消费量以及农业劳动剩余分析发现20世纪初无锡农户面临沉重的人口压力。另外,黄宗智的农业内卷化研究也反映出人口压力下农业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给农户生活水平造成的负面影响。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6月。

② 相关讨论参考李金铮:《也论近代人口压力:冀中定县人地比例关系》,《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李金铮从定县案例中分析得出20世纪初定县耕地基本能够满足人口粮食需求。

③ “无锡、保定农村调查”对同一地域(无锡和保定)的农户经济实况进行了长时段连续追踪调查,其最早开始于1929—1930年,随后分别于1958年、1987年和1998年先后进行过三次调查,包含了两地数千农户近70年的家庭经济数据。1958年进行第二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时,调查队对新中国成立前的情况选择了三个观察年份进行回溯调查,分别为1929年(保定为1930年)、1936年和1948年(保定为1946年)。这些详尽的家庭调查数据为历时性地研究农户家庭经济变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关于“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的具体介绍可以参考,史志宏:《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的历史及现存无、保资料概况》,《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3期。

④ [英]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王惠惠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⑤ 关于学者们对近代中国人口问题的讨论,参考曹树基、陈意新:《马尔萨斯理论和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评美国学者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⑥ 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308-314.

减,且长三角的小农农业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内仅维持着一种糊口水平<sup>①</sup>。以人地比例为基础的人口压力说已然成为近代中国农民生活水平下降的主要理论支撑之一。

前述人地压力说的诸多理论强调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紧张关系,实则代表的是一种绝对人口压力,通常以人地比例、农业劳动力边际报酬、农业剩余劳动力、农业资本剩余等指标衡量。绝对人口压力一定程度上反映农民的生存压力,但并不能代表农民生存压力的全部事实。在亚当·斯密看来,人口对于提升劳动生产力、促进商业贸易以及扩大市场范围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后者的发展又进一步维持了人口的再生产。因此,人口压力的考察还需要衡量劳动人口在其他部门的就业情况及其对生活的改善。只有充分考虑到人口、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的交互影响,才能更加准确地反映人口压力的事实以及人口压力对于历史的影响。这种人口压力也是一种更广泛视角下的相对人口压力<sup>②</sup>。一些学者也注意到土地之外的生产资源对提升农民生活水平的积极作用,从而为我们考察相对人口压力提供一些借鉴。如吴承明通过考察近代农业发展,认为农民长于精打细算,并不会因为人口压力而将剩余劳动力无限投入到土地之中,他们还有村外就业以及家庭手工业等其他出路。吴承明虽赞同黄宗智所说的农业边际产量存在递减,但他认为这种劳动力的投入情况对小农生存需求来讲仍旧存在效用<sup>③</sup>。马若孟一方面认为20世纪初华北农户仅靠农业收入难以维持家庭生计,另一方面肯定了城市工商业发展对农户生活的改善作用<sup>④</sup>。史建云强调农村手工业的发展和分工增加了农户就业机会<sup>⑤</sup>。马若孟和史建云的观点符合“斯密型增长”对人口因素的肯定作用。此外,龚启圣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无锡农户的分析发现,一部分处于人地压力下的农户选择外出就业,并获得了可观的工资收入,而这主要得益于他们较高的人力资本<sup>⑥</sup>。以上理论表明人口与土地的张力在各种生产资源与自然、社会环境的交互影响下不断改变:当有限的土地资源成为农户赖以生存的主要保障时,人口的增长就会加大生存压力。另一方面,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农村商业的发展维持了日益庞大的人口,从而缓解了人口压力。此外,依据龚启圣的研究,人口质量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对提升农户生活水平更为重要<sup>⑦</sup>。

基于上述理论,考察近代中国人口压力需要重新理解人口因素与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的互动关系。现有文献对近代中国人口压力的研究在测量指标上仍旧侧重于分析人地比例、人均粮食消费量、耕地可养活的人数以及农业剩余劳动力,研究数据主要以统计数据为主,结论上则偏向于认为近代人口压力较为严重。也有少数学者持否定态度,认为民国时期尤其是20世纪初的人口压力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sup>⑧</sup>。

①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第1-11页。

② 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6页。

③ 吴承明:《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

④ 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3,155页。

⑤ 史建云:《商品生产、社会分工与生产力进步:近代华北农村手工业变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

⑥ James Kai-Sing Kung, et al., "Human Capital, Migration, and A 'Vent' for Surplus Rural Labor in 1930s China: the Case of the Lower Yangzi",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64, No. S1, 2011, pp.117-141.

⑦ 伊懋可认为明清长江下游市场与农村工业的发展维持了日益庞大的人口。此外,黄宗智也把工资劳动视为人口增长的一种可能的刺激。相关分析讨论见,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0页。

⑧ 绝对人口压力的相关讨论见李金铮:《也论近代人口压力:冀中定县人地比例关系》,第139-140页。李金铮对学术界相关人口压力的争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总结和归纳,之后又从统计数据估算定县人地比例以及最低人均粮食消费和生活消费,并认为20世纪初中国农村人口压力被夸大。此外,对绝对人口压力进行探讨的文章还可以参考,张丽:《人口、土地和农业生产力水平:二十世纪初无锡农村地区人口压力的测量》。张丽认为20世纪初无锡农村存在严重的人口压力,主要采用当地人口和土地的统计数据,但她仅从人均粮食消费来考察,并不能反映农户实际收入和实际消费之间的关系。另还可参考,王跃生:《中国人口压力的历史和现实考察》,《历史教学》2013年第22期。王跃生注意到绝对人口压力和相对人口压力的问题,侧重历史角度的理论分析。



本文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保存的“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资料中的无锡农户数据分析近代中国农户的人口压力以及生存压力,探究的问题包括:从微观层面分析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无锡农村是否存在人口压力?如若存在,对人口压力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人口规模、土地、工业化和商业化对人口压力有何影响?人口压力的现状又对个体农户的生存压力和农村经济的整体发展有何影响?文章使用的数据主要为1929年和1936年无锡的农户调查数据<sup>①</sup>,具体包括六百多户农户的家庭人口、阶级身份、土地占有和耕种面积、人口职业情况、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等信息。这些微观数据能够分析和对比不同年份个体农户的实际收入(包括土地收入和各项非农收入)和劳动力情况,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人口压力和相对人口压力的测量更加准确并且能够具体到个体农户层面。此外,现有文献主要采用人均粮食最低消费量作为估算人口压力的指标之一,一方面略显单薄,不符合农户消费事实。另一方面,如李金铮所言,人均最低粮食消费标准各地不一,且可靠性和准确性有待考证。虽然李金铮按照“大口小口一月三斗”的民间说法估算年人均粮食消费量,但其计算方式仍旧如很多其他文章一样,忽略了基于性别和年龄差异的人口口粮消费<sup>②</sup>。

本文人均最低消费标准参考Robert Allen等人依据亚当·斯密的“生存价格(price of subsistence)”概念而拓展出的一篮子物品标准,以一篮子物品的价格表示一等成年男子维持一年基本生存的最低花费。Allen等人在选取和确定近代中国农户的一篮子物品及其数量时主要参考了国际营养学标准以及20世纪初的“满铁”调查和“国立农业调查委员会”所做的农村消费调查,因此他们对于当时中国农村一成年男子维持生存所需最低花费的测量较为准确可信<sup>③</sup>。基于性别和年龄差异,家庭人口的最低生活消费也各有不同。考虑到人口的消费差异,本文依据20世纪初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在吴兴农村调研时对“等成年男子”的计算方法,将家庭人口折算为等成年男性,具体方法是:1成年女性=0.8等成年男性,1儿童(14岁以下)=0.5等成年男性<sup>④</sup>,并以此计算家庭的最低生存花费(家庭等成年男性人数乘以一个等成年男性一年最低生存花费)。文章首先从人口和自然资源(以土地和土地收入为主)的角度分析无锡农户的绝对人口压力,再从种植业之外的生产资源和就业途径分析相对人口压力,其中主要考察农村雇工、非农副业以及村外非农就业对缓解绝对人口压力的作用,同时也从侧面考察人口因素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对经济发展的多重作用。

## 二、绝对人口压力的考察

绝对人口压力主要表现为在农业生产力水平一定的情况下,人口与土地资源之间出现严重的比例

① “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资料实际上包含了民国时期无锡在1929年、1936年和1948年三个年份的数据,本文主要考察1929年和1936年两个年份,主要原因在于学术界对近代人口压力的争论主要集中于此时间段,且抗战前的1927—1937年是国民政府经济发展较为稳定的十年,人地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受战争影响较小,便于横向分析和纵向比较人口压力和生存压力。

② 李金铮的文章并未直接讨论各地人均最低粮食消费标准,而是讨论了各地养活一人所需的亩数标准。在农业生产力和技术不变的前提下,地亩数直接关系到土地粮食产量,因此与人均粮食最低消费标准直接关联。参考李金铮:《也论近代人口压力:冀中定县人地比例关系》,第146页。

③ Robert Allen等人提出的一篮子物品包含了满足每人每日最低1940卡路里热量需求的碳水化合物以及一些肉类、衣物、燃料、灯油等物品。具体参考R.C. Allen, J.-P. Bassino, D. Ma, C. Moll-Mu rata, J.L. Van Zanden, "Wages, Prices, and Living Standards in China, 1738 - 1925: In Comparison with Europe, Japan, And India",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64, No. S1, 2011, pp. 8-38.

④ 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吴兴农村经济》,李文海、夏明方、黄兴涛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乡村经济》(上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774-776页。

失衡,基本生活资料已无法满足人口的增长,民众生活水平逐渐下降。依据“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资料,我们整理出1929年和1936年无锡农村人地比例的基本情况(见表1)。调查地区的农户人口总数在1929—1936年间略有上升,人均使用农地面积则有所下降,两个年份的人均使用耕地面积均不超过2亩,低于全国人均3.5亩的平均水平<sup>①</sup>。对于养活一人需要多少亩土地,现有文献说法不一,且主要针对华北地区,与江南地区农户消费实况仍有差异。曹幸穗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的苏南地区,2亩地才能满足一人衣食之需<sup>②</sup>。依据曹幸穗的标准,1929年和1936年无锡农户的人均使用农地面积均无法满足一人基本生存。但曹幸穗对于2亩地的标准并未做过多说明,不知其依据何来。我们用等成年男子一年的生存花费重新做出估算。根据前文提到的一篮子物品种类和1929年、1936年各物品的零售价格,得出1929年和1936年一等成年男性为维持一年基本生存所需的花费分别为69.77元和58.01元<sup>③</sup>。从两个年份的种植业毛收入以及农地使用面积计算,1929年和1936年每亩农地实际获得的毛收入为22.76元和23.66元,分别需要3.07亩和2.45亩土地才能维持一等成年男子一年的生存。

将两个年份的常住人口总数折合为等成年男性数量,则每一等成年男性的种植业收入分别为51.41元和48.55元。结合等成年男性的年生存花费计算,1929年和1936年每一等成年男性的种植业收入分别仅够养活0.74和0.84个等成年男子。如若将种植业收入再减去生产成本,则养活的人数更少。如若考虑土地分配不均的现实,则每个家庭种植业收入之于维持生计的作用又各有差异。

表1 无锡农村人口及耕地情况

年份	户数	总人口	总劳动力	常住人口	在外人口	常住等成年男性总数	人均使用农地(亩)	种植业收入(元/常住等成年男/年)	生存费用(元/等成年男/年)
1929	647	3128	1933	2855	273	2098.30	1.58	51.41	69.77
1936	630	3020	1873	2724	296	1994.10	1.39	48.55	58.01

资料来源:“无锡、保定农村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内部资料。

说明:1.1929年和1936年的户数以及人口是排除数据缺失的农户得出,并不是无锡农村的实际总人口数和总户数。依据张丽所用的“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统计数据,从1929年到1936年无锡11村人口从3432人增至3592人。参考,张丽:《人口、土地和农业生产水平:二十世纪初无锡农村地区人口压力的测量》,第49—50页。

2.人均使用农业用地是土地租佃过后的农业用地面积除以总人口。

3.“种植业收入”指种植于土地上的稻、麦、桑、豆以及其他农作物所获得的收入。

1929年和1936年无锡地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人地压力的变化趋势。依据古典经济学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计算方法(农业劳动力拥有量减去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本文对无锡地区两个年份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进行了如下估算,见表2<sup>④</sup>。按照曹幸穗所述,无锡农村一个等劳动力可耕6亩地。张丽通过对无锡农户的访谈得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无锡农村一个壮劳力一年可种田10亩,管理桑地5亩,田地比例按照稻八桑二划分。“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综合报告称“按过去经验,一人

① John L. Buck,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New York: Paragon, 1937, pp.268—278.

② 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02页。

③ 有关一篮子物品的零售价格参考了“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的原始数据、《无锡市物价志》、《抗战前价格参考资料》第四册中记录的1936年无锡主要生活物品的零售价格。具体参考了无锡市物价局编:《无锡市物价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物价局编:《抗战前价格参考资料》,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此外,最低生活花费的单位货币统一为1957年的人民币,原因在于“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数据集中的货币单位已经统一为1957年的人民币元。

④ 此处“农业剩余劳动力”主要指“小农业”,即种植业,以便重点考察人口与土地的关系。

起码可种七、八亩(地)”<sup>①</sup>。对比三种说法的精确度,本文采用张丽的标准测量农业劳动力需要量。假设男性劳动力全部投入农地生产,而女性从事养蚕和家务,则计算出的男性农业劳动力剩余率在1929年和1936年分别为32.02%、39.73%。假设男女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且无差别投入农地生产,则两个年份的农业劳动力剩余率分别为66.38%和70.04%。从整体水平上看,种植业收入与基本花费之比以及农业剩余劳动力两大指标均反映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无锡农村的人口容量相对土地资源来讲已经过剩,绝对人口压力确实存在。

表2 绝对人口压力下无锡地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估计

年份	总壮劳力	男壮劳力	耕地面积 (亩)	每壮劳力可耕面积 (亩)	理论壮劳 力需要量	农业劳动力 剩余率 <sup>1</sup>	男性劳动力 剩余率 <sup>2</sup>
1929	1691.38	836.5	4738.81	田10亩,地5亩	568.65	66.38%	32.02%
1936	1638.88	814.63	4091.68	田10亩,地5亩	491.00	70.04%	39.73%

资料来源:依据“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资料计算所得。

说明:1.“农业劳动力剩余率”主要指以土地资源为基础的种植业,并假设男女劳动力都无差别投入种植业生产中。

2.“男性劳动力剩余率”假设只有男性从事种植业生产,女性则从事家务和养蚕活动。

### 三、相对人口压力的考察

#### (一)劳动力的就业与分布

绝对人口压力之下,一部分剩余劳动力会在其他产业部门寻求就业机会,从而加深斯密型劳动分

表3 无锡农村劳动力职业统计

1929年			1936年		
村内就业人数		村外就业人数	村内就业人数		村外就业人数
农业	1073	4	农业	1014	5
	总计:568	总计:219		总计:540	总计:270
	其中:	其中:		其中:	其中:
	手工业者:64	手工业者:28		手工业者:64	手工业者:37
非	产业工人:16	产业工人:60	非	产业工人:25	产业工人:72
农	工商业主:8	工商业主:16	农	工商业主:11	工商业主:12
业	商贩:14	店员:26	业	商贩:13	店员:29
	医生、教师:2	医生、教师:18		医生、教师:6	医生、教师、军政:15
	家务劳动者:435	家务劳动者:14		家务劳动者:385	家务劳动者:18
	其他:29	其他:57		其他:36	其他:87
农民	手工业:117		农民	手工业:117	
兼业	商贩:67		兼业	商贩:65	
	其他:61			其他:69	

① 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第111页;张丽:《人口、土地和农业生产水平:二十世纪初无锡农村地区人口压力的测量》,第53-54页。《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编:《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解放前后无锡保定农村经济》,河北省廊坊市印刷厂,1988年,第32页。张丽的文章中“壮劳力”指年龄在20-45岁的男性劳动力,假设男女性别比为1:1,壮劳力和半劳力比为3:1。张丽的劳动力人数估算比较笼统,无法具体到每户情况,三个年份的劳动力变化以及劳动力性别比也无从得知。相比之下,本文利用的“无锡、保定农户调查”资料中的劳动力数据对各个年点的劳动力性别做了详细统计,但遗憾的是没有年龄数据,为了估算壮劳力的数量,我们在此引用张丽的方法,以壮劳力:半劳力=3:1进行估算。

资料来源:依据“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资料统计得出。

说明:空白处无数据。

工。无锡农户受惠于处长三角的地理优势,不仅更加容易在大都市找到非农工作,还能享受长三角商业发展和市场扩张带来的经济效益,以发展农村工商业。无锡农户的微观数据显示了1929年和1936年劳动力在各部门以及村内外的就业情况(表3)。村内劳动力主要分布在农业部门,两个年点以农业为主业的劳动力分别占总劳动力的55.51%和54.14%,以本地非农职业为主业的劳动力分别占总劳动力的29.38%和28.83%。1929年外出就业的劳动力占到总劳动力的11.54%,这一比例到1936年上升至14.68%。

村外劳动力分布于工商业中的人数远大于农业部门,这些劳动力在城市中成为产业工人、手工业者、店员以及家务劳动者等。少数资本富足者在城市中经营工商业,也有少部分人因为人力资本较高从事教师和医生等专业工作。当进一步考察村外劳动力的文化水平时,我们发现1929年和1936年村外就业的劳动力中受过教育的人数分别高达52.89%和60.45%。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劳动力基本分布于村外,这表明人力资本高的劳动力更容易在城市就业(图1)<sup>①</sup>。龚启圣对无锡农户的研究认为农户外出就业主要受城市高工资的吸引而不是源于贫困,且无锡农村劳动力市场具有等级性:人力资本高的农户移民到上海等大都市寻求更高的工资待遇,而无锡周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户迁移进本地农村,成为佃农或农业雇工<sup>②</sup>。按照龚启圣的观点,无锡农村地区劳动力的流入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当地市场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而这一需求在极端的人口压力之下是不可能存在的。由此可推测在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情况下,无锡农村的人口压力还没有达到临界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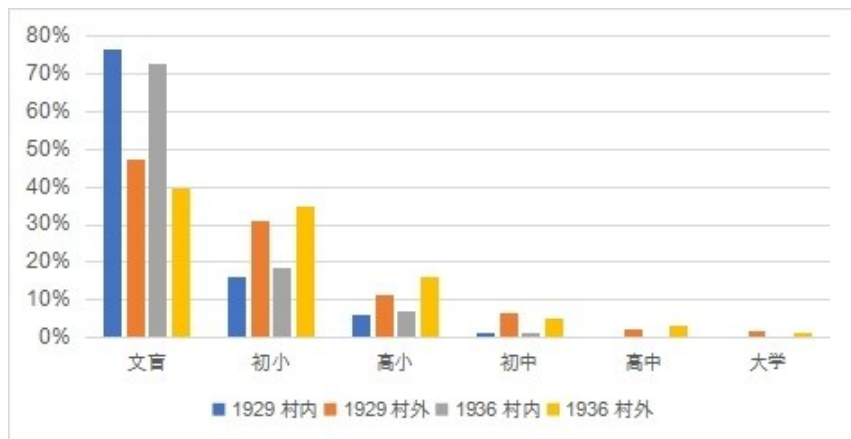


图1 1929、1936年无锡农村劳动力各教育程度的人数比例

资料来源:此图依据“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资料整理得出。

① “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资料中“文化状况”的相关数据主要针对14岁以上人口。鉴于民国时期的农村劳动年龄普遍较早,本文故将14岁以上人口视为劳动人口,二者之间虽有一定差别,但数据上的差距不大,由此得出一个对无锡农村劳动力的文化水平的大致估计。

② James Kai-Sing Kung, et al., "Human Capital, Migration, and A 'Vent' for Surplus Rural Labor in 1930s China: the Case of the Lower Yangzi", p.117. 我们所使用的“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资料并未显示移入无锡本地的外来人口情况,但我们依据调查资料中土地租入、租出,农业雇入雇工和出雇数据可以推测被调查的地区存在村外移民。此外,参考江苏省农民银行无锡分行在20世纪30年代初主持的无锡开原乡调查也能证实无锡农村存在外地劳动力迁入情况:客户数占全区9.2%,均属佃农,极少数自有田地,山南居民多从事工商业,山北田多人少,均不得不招佃承租。参考:顾倬:《江苏无锡县农村经济调查第一集(第四区)》,李文海、夏明方、黄兴涛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乡村经济》(上卷),第627页。



## (二)相对人口压力下的农业剩余劳动力

依据表3中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部门的分布人数,我们进一步分析了相对人口压力下的农业剩余劳动率。无锡农户调查并没有详细记录以农业为主业的人口之性别,我们假设以农业为主的劳动力性别比为1:1,且从事种植业的劳动力全部为男性,按照全劳力和半劳力3:1的比例计算种植业中的男性壮劳力数量,则两个年份投入种植业中的男性壮劳力分别为469.44和443.63个。与表2中的理论壮劳力需要量相比,两个年份男性壮劳力分别缺少99.21和47.37个。此种假设下不仅种植业的劳动力没有过剩反而还存在劳动力不足,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被调查地区存在外来农业劳动力流入的情况。如果将以农业为主的劳动力(不考虑性别基础上的生产率差异)全部投入种植业,则两个年份的农业剩余劳动率分别为39.43%和44.66%,低于绝对人口压力下的农业剩余劳动力(66.38%和70.04%)。考虑到桑蚕业(本地最大副业)、畜牧业以及本地农民兼业所消耗的农业劳动力,则整个大农业的剩余劳动率不会太高。一般我们认为在农业技术水平不变且人多地少的情况下,单位土地投入的劳动力增加会造成劳动边际效益递减,从而导致农业内卷化发展。从劳动力利用角度来讲,本文所考察的无锡地区农业内卷化程度并没有特别严重:土地资源对生计的贡献不足加上非农就业对收入的改善促使农户不会将家庭劳动力全部投入到有限的土地当中,而是依托本地和外地工商业的发展转移部分劳动力,减缓了单位土地投入劳动力过量的问题。这一点也可以从本地农业雇入长短工人数以及出雇长短工人数的对比中得到印证。以1929年为例,本地农副业雇入长工94人,短工14530.5个工时(按单位劳动力一年工作300个工作日计算,合48.44个劳动力)。本地农副业出雇长工20人,短工6257.5个工时,合计20.86个劳动力。据此计算,本地雇入长短工总人数比出雇长短工总人数多100人左右,而这100人极有可能来自无锡周边人口压力更严重、生活更贫困的农村地区。

## 四、人口压力下农户生存发展的突破与限制

家庭收入与人口消费直接关系农户的生活水平。种植业收入反映了绝对人地压力下的生活水平,种植业之外的收入反映出农户利用土地之外的生产资源以缓解人地压力和改善生活水平的途径。表4统计出农户的各项收入来源及其各种收入所能供养的等成年男性数量。1929年和1936年的总收入分别能够养活2497.02个和2833.48个等成年男性,但由于各项收入并没有统计详细生产成本,实际纯收入所供养的等成年人数应该比表4中的总人数少。我们只能粗略估算各项生产活动的净收入,以便对比各种收入对于供养人口的不同贡献。此外,我们在已有总收入数据的基础上重新估算了被调查农户的总净收入,发现1929年和1936年全部被调查农户的总净收入除了维持家庭人口的基本生存外,户均分别盈余22.22元和55.19元<sup>①</sup>。黄宗智在对江南农户的研究中认为小农农业从14世纪后半期直至20世纪80年代都处于糊口水平<sup>②</sup>,但从本文所分析的无锡农户的平均生活水平来看,被调查农户的生活境况略高于糊口水平,且1936年的实际生活水平高于1929年。

图2在表4的基础上分别对1929年和1936年无锡农户各种收入及其对生计的贡献做了横向比较。从图2可知,两个年份内种植业仍旧是维持人口生计的主要收入来源,其次为出售蚕茧和牲畜的收入。本地副业(以工商业为主)对农户生计的贡献基本在11%~16%之间。1929年剥削收入的供养人数比为

① 参考隋福民的方法,将种植业收入的30%作为农业的生产费用,隋福民:《保定11个村人均纯收入水平与结构的历史变化(1930—1998):基于“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数据的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4期。除生产费用外,本文所计算的纯收入还减去了借贷利息支出。纯收入的计算方法是总收入减去种植业收入的30%再减去年借贷利息。

②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第1页。



13.18%,仅次于本地农业收入,但这一比例在1936年下降到12.49%,低于本地农业和副业收入的供养人数比。1929年和1936年的本地出雇收入供养人数比并不高,基本在2%左右。值得注意的是在外人口寄回收入,两个年份中占总劳力11%~15%的在外劳力支撑了8%左右等成年男性人口的生计。

表4	无锡调查地区农户收入结构、收入水平及其对生计的贡献			
	1929年		1936年	
	总计(元)	可养活等成年人数	总计(元)	可养活等成年人数
种植业收入 <sup>1</sup>	61221.96	877.48	66418.06	1144.94
农业其他收入 <sup>2</sup>	41061.49	588.53	27498.48	474.03
本地副业收入 <sup>3</sup>	20783.84	297.89	26029.86	448.71
本地出雇收入	4127.28	59.16	4653.01	80.21
出售财产收入	1015.69	14.56	2937.23	50.63
在外人口寄回收入	15282.35	219.04	13019.25	224.43
剥削收入	22954.79	329.01	20527.91	353.87
其他	7769.47	111.36	3286.19	56.65
总计		2497.03		2833.47

资料来源:收入数据是依据“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计算得出,供养人数是各收入除以对应年份等成年生存花费(见表1)计算得出。

说明:1.“种植业收入”是植物栽培收入减去租税和雇工成本的收入。  
2.“农业其他收入”指出售蚕茧和牲畜的收入。  
3.“本地副业收入”包括从事商品性手工业、独立工匠、教书行医、经商运输等的总收入,该总收入减去了副业雇工成本。农副业的雇工费用按照1:1估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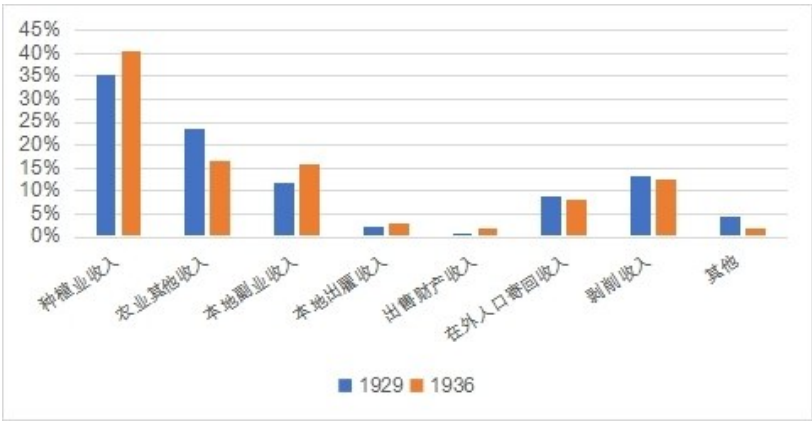


图2 1929年和1936年无锡被调查农户各收入能够养活的等成年男性数量比例

资料来源:依据表4数据计算得出。

从平均水平上看,绝对人地压力下的无锡被调查农户通过土地外资源缓解了家庭生存压力。1929年本地副业、本地出雇以及村外就业的收入所供养人数比占到23.07%,这一比例到1936年提升至26.59%,这与长三角地区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不无关系,而这些发展一方面受惠于长三角工商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受人口因素的影响:正是由于无锡被调查地区人多地少、农业劳动力过剩的现实,使得一部分劳动力得以从农业部门分离出来;劳动分工在家庭内部和不同产业之间逐渐加深,并受劳动力教育水平、性别、年龄以及技能的影响。无锡地区农业人口、工商业发展以及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体现了斯密型动力在减少人口超越资源这一方面的作用。在斯密主义框架内,一些学者注意到农村

手工业和工资劳动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新增人口的生存<sup>①</sup>。但这一普遍性结论仍需谨慎对待。无锡农户案例表明农村工商业发展仅对维持现有人口的生计有辅助作用,它对于引起人口增长的作用尚未清楚。更何况对于不同家庭而言,其是否能从农村工商业发展中受益又受家庭、社会、制度等多方因素的影响。

从家庭微观层面看,农户面临的人口压力和生存压力又各有不同。已有很多文献从封建土地制度方面道出了土地分配不均,农户财富悬殊的事实。土地、财富以及人口的紧密关系显而易见。如土地的多少决定传统农耕社会农户的家庭收入,而收入又决定着家庭能够养活的人口。个体农户如何配置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和人口)以缓解人地压力带来的生存压力?表5统计了20世纪初无锡被调查农户的户均人口、消费和收入结构。各年份的户均净收入除了满足全家人口的基本生计外略有盈余,但平均数带有一定的欺骗性。据样本统计,1929年占64.3%的农户收入无法维持生计,1936年这一比例降至51.75%。可见个体农户的收入差距非常大。我们从人地比例(家庭土地占有量与总等成年人数)的角度计算了1929年和1936年仅依靠土地收入而能维持生计的农户比例分别为11.28%和15.40%。如果将农户土地之外各种收入来源计算在内,则两个年份能够维持生计的农户比例升至35.7%和48.25%。由此可见,人地压力之下,土地外的各种收入对于改善无锡被调查农户的生活水平而言意义重大。

此外,通过横向对比每一年份的各项收入,我们发现在外人口寄回收入和剥削收入在所有收入中的回报率最高,体现了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在收入分化和提升生活水平中的作用。然而两个年份内拥有这两项收入的农户数比例都不高,基本在15%~17%之间。这一定程度上说明即使在工商业发达、城市化和市场化发展迅速的长三角地区,劳动人口在不同部门的分配仍然深受家庭人口结构、教育水平以及家庭资本积累的影响。城市化以及工商业发展虽然能够弥补农家生计之不足,但更有可能加重农户间的贫富分化。

表5 无锡农户户均人口、消费和收入统计 (消费、收入单位:元/户)

	1929年		1936年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家庭等成年男性总数	3.61	1.55	3.58	1.51
家庭生存花费	251.81	107.94	207.92	87.76
家庭净收入 <sup>1</sup>	274.03	500.71	263.11	447.20
种植业收入 <sup>2</sup>	105.56	144.09	114.05	135.54
农业其他收入:蚕茧、牲畜	76.61	73.19	56.58	63.32
本地出雇收入	27.89	28.72	27.86	29.96
本地副业收入 <sup>3</sup>	75.91	123.28	91.74	131.96
出售财产收入	67.71	69.33	267.02	330.28
在外人口寄回收入	160.87	252.31	120.55	133.70
剥削收入	203.14	1000.31	205.28	923.19

资料来源:依据“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资料中的数据计算得出。

说明:1.“家庭净收入”是“家庭总收入”一项减去种植业收入的30%后再减去家庭年借款利息。

2.“种植业收入”是减去租税以后的收入。

3.“本地副业收入”包含商品性手工业、独立工匠、经商、运输、教书行医等获得的收入。

以1929年为例,我们进一步对比分析了无法维持生计和能够维持生计两类农户的人口和收入情况(在此分别以贫困农户和相对富裕农户表示),见表6。两类农户的户均人口数量并无太大差距。相对富裕农户的人均占有土地、人均使用土地和家庭教育水平远高于贫困农户,可见土地和人力资本对农户生计影响较大。两类农户在收入水平上差距最大的是剥削收入,相对富裕农户的户均剥削收入是贫困

①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第39页。

农户的9倍,户均种植业收入是贫困农户的3.16倍,差距最小的是出雇收入,为贫困农户的0.9倍。值得注意的是,贫困农户的收入中占比最大的是在外人口寄回收入(26.61%),其次为种植业收入(16.52%),加上贫困农户人均占地面积只有0.67亩,我们据此认为外出就业的人中有一部分是迫于人地压力以及贫困,这一点与龚启圣的观点不同<sup>①</sup>。我们进一步统计了1929年贫困农户中外出劳动力的文化水平,发现文盲93人,占该年村外劳动力文盲总数的81.58%,他们主要在城市中从事工业生产和其他职业,虽然数据库中并未对“其它”职业做出说明,但推测应该为一些非技术性的低工资工作。此外,相对富裕农户的户均在外人口寄回收入是贫困农户的2.73倍,他们当中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人数占到在外劳动力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总人数的80%。这进一步说明:部分因人地压力和贫困而外出就业的农户虽然能获得比从事种植业回报更高的非农收入,但他们因为较低的人力资本而只能在城市中从事工资相对较低的非农职业。

表6 1929年无锡地区贫困农户和相对富裕农户的户均人口、土地和主要收支的对比

	贫困农户	相对富裕农户
总户数	416.00	231.00
户均人口	5.00	4.54
占有土地(亩/人)	0.67	2.94
使用土地(亩/人)	1.12	2.42
家庭教育水平 <sup>1</sup>	0.19	0.34
种植业收入(元) <sup>2</sup>	59.60	188.32
蚕茧和牲畜收入(元)	53.05	111.77
本地副业收入(元)	46.59	127.50
本地出雇收入(元)	28.76	25.75
出售财产收入(元)	43.52	104.00
在外人口寄回收入(元)	96.00	262.55
剥削收入(元)	33.31	299.85
租税总支出(元) <sup>3</sup>	26402.57	13169.10
债款总利息(元) <sup>3</sup>	8829.96	4117.51

资料来源:依据“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资料中的数据计算得出。

说明:1.“家庭教育水平”的估算首先按照文盲到大学的不同教育经历分别赋值:文盲:0;初小和高小:0.25;初中:0.5;高中:0.75;大学:1;然后根据各教育经历的赋值乘以对应人数后求出总和。

2.“种植业收入”是减去租税后的净收入。

3.“租税总支出”和“借款总利息”不是户均值,而是分别取贫困农户和相对富裕农户的总值。

上述收入差距一方面表明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本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另一方面隐含着生计与阶级的联系。为了进一步分析两类农户的阶级情况,我们统计出贫困农户和相对富裕农户的阶级成分以及每种成分农户数占各自总农户数的比例,见表7。表7显示能够维持生计的农户中中农的比例最大,数量占到维持生计农户总数的32.90%,其次为地富阶级,占比26.84%,再次为贫雇农,占比21.65%。无法维持生计的农户中,贫雇农占比最大,达到62.74%。从阶级成分内部来看,89.86%的地主富农都能够维持家庭生计,而83.92%的贫雇农陷入生计困境。与贫雇农境遇相似的还有工人阶级,虽然被调查农户中工人阶级的户数不多,但71.70%的工人阶级家庭无法实现温饱。

<sup>①</sup> 龚启圣认为无锡农村的移民就业不是因为土地缺乏而是人力资本高的人追求高回报使然。参考,James Kai-Sing Kung, et al., "Human Capital, Migration, and a 'Vent' for Surplus Rural Labor in 1930s China: the Case of the Lower Yangzi", pp.117-141.



表7 1929年无锡地区贫困农户和相对富裕农户各阶级成分的户数统计

	地富	中农	贫雇农	工商业主、资本家	工人	其他
相对富裕农户	62.00	76.00	50.00	14.00	15.00	14.00
贫困农户	7.00	82.00	261.00	4.00	38.00	24.00
总农户	69.00	158.00	311.00	18.00	53.00	38.00

资料来源:依据“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资料统计得出。

农户家庭人口、土地规模和经营活动不仅决定家庭的生活水平,还从微观上影响着农业经济的发展。1929年,被调查农户中有64.3%的家庭无法维持生计,他们所使用的农地面积几乎占总农地面积的一半。这些农户根本没有剩余资金对所使用的土地进行可持续性投资。除非借高利贷,而高利贷又是加重农户贫困的原因之一。据样本统计,1929年贫困农户所付出的租税和利息总额是相对富裕农户的2倍左右,占有所有贫困农户总收入的39.06%。相对富裕农户的税费和利息负担仅占其收入总和的13.06%。高额地租和利息是左右无锡农户生产价值再分配的重要因素之一,它们加重了贫富差距,使从事土地生产的农户没有资本进行农业投资。相比之下,相对富裕农户使用占50.97%的农地,户均使用农地面积10.46亩,再依据他们的收入与生存花费之差可知相对富裕农户的户均剩余资金为244.85元。如若将剩余资金全部投资于现有土地,则每亩土地可投资23.41元;如果将剩余资金用于购买土地,按照中等田60元/亩计,则户均约可购买2亩田<sup>①</sup>。

实际上富裕农户对农业的投资要低很多:第一,相对富裕农户中的地富阶级占比较大,他们的实际消费水平远高于贫雇农,所以资本剩余扣除奢侈消费后会大幅度降低。第二,相对富裕的农户,尤其是地主阶级并不会将剩余资本全部投入农业。据“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综合报告显示,20世纪初无锡被调查的地富阶级均有投资工商业的情况,如毛村有9户地主开设粉坊;东吴塘、龚巷两村有10户地主富农开设酒坊;还有些村地富阶级投资运输业和拉丝棉产业。调查报告进一步指出,地主富农将获得的地租利息用于投机和剥削,后又将获利所得购买土地以扩大剥削,这样相互利用,循环往复<sup>②</sup>。这种剥削行为对当时农业生产水平的提升没有实质性帮助。

为从理论上进一步分析相对富裕农户对土地的投资能力以及对地权重新分配和人地压力有可能造成的影响,表8统计了1929年相对富裕农户的土地面积和收入剩余情况。其中中农和贫雇农使用占40.68%的土地,他们对农业生产投资的动机最为强烈,但他们的资金剩余仅占总资金剩余的20%左右,平均每户剩余资金约50元(银元),还不够购入一亩中等田的价格;按他们所使用的土地面积计算,则平均每亩土地剩余资金6.48元(银元),也不可能大量投资现有土地。因此,相对富裕的中农和贫雇农通过一年劳动所得的剩余资金购入土地或扩大农业生产的能力十分有限。

地主、富农和工商业主的收入剩余占到总收入剩余的70%左右。这些富裕农户并不会偏向农业生产投资,也不会将剩余资本悉数投入工商业。如前文所述,许多地主、富农以及工商业主从事工商业活动具有投机性质,不少地富阶级更热衷于购买土地以赚取地租或者放贷获取高额利息。加上地富阶级的奢侈消费,社会有效资本积累不足以推动农业和工业的双向发展<sup>③</sup>。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伊懋可的

① 曹幸穗依据1940年满铁在苏南的调查,估计苏南地区中等田的价格为每亩60元左右,换算为1957年的人民币币值后,户均剩余资本大概可购买2亩左右中等田。参考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第100页。

② 《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编:《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解放前后无锡保定农村经济》,第5页。

③ 对于近代中国农业和工业的发展以及“高水平陷阱”的相关讨论可以参考曹幸穗、姚洋等人的文章。曹幸穗认为地主的奢侈消费以及中小地主众多,分散了社会的有效积累是导致工业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姚洋强调了曹幸穗忽视的一面,即农村高利贷促进了现代农业要素进入小农生产,且平均回报率比投资工业更可靠。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第50页。姚洋:《小农与效率:评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

“高水平陷阱”所提出的近代中国农业部门没有足够的资本剩余去发展工业。然而与伊懋可不同的是,从家庭微观视角分析,农村人口并没有消耗掉农业生产剩余,实际上是封建地租和高利贷加重了个体农户的贫富分化和投资能力差异。难以维持生计的农户无力投资农业生产资料,人力对于他们是最廉价甚至无需成本的生产资源,这样农业技术和机器的引进就既不可能也显多余。另一方面,地主富农对高额回报的地租和高利贷的投资偏向并没有增加他们对农业生产投资的热情。当然,富裕农户可以通过高利贷的形式将农业生产剩余资金回流到贫雇农手中,从而一定程度上加强贫雇农对农业生产的投资能力。但据本文所观察的无锡农户,1929年占总农户53%的贫雇农都无法维持家庭生计,他们如果借高利贷,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生存而不是发展。

表8 1929年无锡地区相对富裕农户中各阶级的户数、使用土地面积和资本剩余的占比统计

阶级成分	户数(%)	占有土地面积(%)	使用土地面积(%)	资本剩余(%)
地主	10.82	55.02	19.52	40.85
富农	16.02	21.41	32.95	23.18
中农	32.90	15.58	28.39	15.65
贫雇农	21.65	4.01	12.29	5.42
工商业主	6.06	1.87	2.32	6.04
工人	6.49	0.93	2.46	5.31
其他	6.06	1.18	2.06	3.54

资料来源:依据“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资料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说明:“资本剩余”是农户家庭净收入减去家庭生存花费。相对富裕农户中的雇农只有1户。

## 结 语

无锡农村调查从一个微观视角揭示了20世纪前半期处于绝对人口压力之下的农户如何在人口与自然资源的紧张关系中寻求生存与发展。以人地比例为主的绝对人口压力并不必然导致家庭的生存危机,城乡工商业的发展以及劳动力市场的活跃都为减轻绝对人口压力、提升农户生活水平、增加小农资本积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工商业发展的规模还不足以实质性地提升农户的整体生活水平,反而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农户间的贫富差距。其原因在于农户从事利润较高的工商业活动的机会并不平等。从无锡农户案例可知,无论是家庭副业、本地工商业还是村外非农就业,都更偏向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较高的农户。贫雇农从事工商业的主要目的是弥补农业产出之不足,他们难以积累有效的社会资本以投资各类生产活动。

限制无锡农户生存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人力资本低和土地占有量少。前者导致农户获取高工资回报的概率降低,后者导致农业收入不足、地租负担过重。在绝对人口压力较大的农业社会中,土地产权对农户生存与发展的影响尤为重要。土地占有不均会加剧收入差距,收入差距进一步造成农户应对生计问题和投资能力的差异,后者又促进了土地的兼并买卖,进一步加重地权分配不均<sup>①</sup>。在这样一个循环往复之下,主要以土地为生的贫困农户将面临越来越大的绝对人口压力,而当这群农户还在为生计忧虑时,其自身的人力资本也难以提升,更不用说在非农就业中增加自身竞争力。由此,少地、无地的贫困农户企图通过非农生产活动改善生活的路径也将变得漫长且艰难。(责任编辑:胡文亮)

① 这一点与曹幸穗对苏南农户的分析相似,曹幸穗认为旧中国苏南农村地区地权大多集中在大地主手中,由于城市工商业收益率大于农村土地的收益率,大地主抛售土地转而投资城市工商业,农村中的中小地主则吸纳大地主出售的土地,贫雇农在与中小地主的竞争中自然处于弱势地位,导致绝大多数土地落入中小地主手中。参考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第51页。